

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出兵行動的戰略思考*

王順文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角色理論的分析架構探討土耳其於敘利亞北部所開展的三次軍事行動，包括：2016年「幼發拉底之盾行動」、2018年「橄欖枝行動」與2019年「和平之泉行動」。角色理論探討國家與他者互動過程中「驅動菁英的行爲」，同時討論「國內政治與制度」，如何透過領導人而呈現出外交政策的樣貌，究係關心他者反應的「角色接受者」，或是強調自我認同的「角色創造者」？是強調國家利益的「獨立角色」？亦或是在乎他者認同的「互動角色」？

據此，本文第一部分將從角色理論與土耳其過去的角色定位談起，進而分析三次行動下，土國所展現出「獨立角色」的「角色接受者」，土國的角色扮演也從過去的「橋樑者」，轉變為有別於過去的積極獨立角色，甚至是區域的領導者。同時，國內政治制度修改成總統制後，更增強總統的權力，未來，總統仍是土國中東政策最重要的一環。

關鍵詞：幼發拉底之盾行動、橄欖枝行動、和平之泉行動、角色理論、土耳其

* 本文蒙科技部計畫補助，並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文修改方向的協助。

* * *

壹、前言

土耳其於敘利亞北部所開展的幾個軍事行動，包括2016年針對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以下簡稱：IS）的「幼發拉底之盾行動」（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2018年針對「人民保護部隊」（People's Protection Units，以下簡稱：YPG）所展開的「橄欖枝行動」（Operation Olive Branch）、2019年針對庫德區域的「和平之泉行動」（Operation Peace Spring）等，都影響了當地區域權力的發展。

首先在2016年8月24日土耳其主張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的「自衛權」開展了「幼發拉底之盾行動」，以因應在敘利亞恐怖組織的行動，主要是IS，但同時也希望對抗PKK（Kurdistan Worker's Party，以下簡稱：PKK），並企圖在敘北建立安全走廊（Yeşiltaş et al. 2017, 9-10）。「幼發拉底之盾行動」歷時約七個月，土耳其不僅成功消除敘土邊界的IS勢力，建立敘土邊界的安全區，同時，戰略目的還包括影響美國的態度，也就是當IS不再是巨大威脅，那麼美國便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再支持PKK分支民主聯盟等（Democratic Union Party，以下簡稱：PYD）¹（劉燕婷 2019）。

土國在2018年1月開始在敘北阿夫林（Afrin）展開「橄欖枝行動」，並在3月佔領Afrin，主要目的是希望YPG的勢力撤出幼發拉底河西岸，因此，美方提出所謂的「曼比治路徑圖」（Manbij Roadmap），並保證YPG的撤出，但土方仍不滿意，2019年8月，土國再次揚言對YPG採取軍事行動，10月初，川普總統（Donald Trump）與埃爾多安總統（Recep Tayyip Erdoğan）通話後，宣

¹ 其實不論敘利亞民主力量（SDF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以下簡稱：SDF）、YPG或PYD，對於土耳其而言都是PKK的分支，也都被土耳其視為是安全的威脅（Abadi 2019）。但相對而言，美國只有將PKK列為是恐怖團體（可參見<https://www.state.gov/foreign-terrorist-organizations/>），這也是美國與土耳其在行動認知上最大的差異。因此，比方說第一次行動雖然主要以打擊IS為主，但是土耳其也同時打擊PKK與相關團體，而在後續的橄欖枝行動與和平之泉行動中亦然，皆有將恐怖份子與PKK相關團體混用的情形。

布美軍退出敘利亞，而後土國並開展了「和平之泉」行動與一系列在伊德利卜（Idlib）的行動。

許多文章質疑土國的行動動機，究係如土國所稱的「安全」問題？還是「強人政治」的展現或「區域強權」的戰略角色？（Pierini 2020; Dalay et al. 2018; Gurpinar 2020）而與主要強權（也就是美俄）有何衝突與妥協？比方說在敘利亞問題上，俄羅斯是支持阿薩德政權，雖然反對自治或聯邦主義的形式，但是支持庫德族在敘利亞有限的文化與行政上的自主。美國方面則是希望降低美國的責任，並將責任分擔至中東的戰略聯盟（Dalay et al. 2018）。但土耳其的外交期待可能會與美俄兩強產生矛盾，而當產生矛盾的時候又如何解決？

本文認為角色理論是一個適合作為土耳其政策改變的分析架構，因為角色理論強調從結構面（也就是外在行為者的角色期待與行為者的角色衝突）以及從行為者面向（也就是行為者的制度與領導者本身的角色認知與限制）進行分析，將有助於我們除了理解國際結構的限制之外，並能分析國家內部的戰略角色如何扮演。國內學者黃瓊萩亦曾透過角色理論分析越南的中國政策，她提出國家同時具備「角色接受」（role-taking）與「角色創造」（role-making）兩種角色，「角色接受」主要受到外在行為者與角色擁有者本身的聲望影響，因此，受聽者的回饋是很重要的。相對的，「角色創造」則主要是認同影響，外在行為者所扮演的角色較為有限（Huang 2020, 527）。放在土國出兵行動的研究上，也同時受到兩個層次的影響：首先在出兵的過程中，外在行為者對土耳其的角色期待與土國的角色扮演是否有衝突？同時，土國為角色接受還是角色創造？另外，在行為者面向上，因為在三次行動中執政黨與領導人並未改變，但是行動上卻越趨積極，是否是因為國內制度上從半總統制調整為總統制的因素，還是領導人的角色認知真的變了？皆是研究的重點。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雖如同角色理論相關學者以文獻分析為主（也就是以土國總統府與外交部資料），但也配合土耳其當地的訪談印證，² 訪談進行的

² 受訪者包括政府官員、學術界與智庫或記者，且不同黨派皆有。不過有鑒於現在土耳其從2016年政變後的政治氣氛，受訪者未必願意接受訪問或者真實表達其意見與黨派

方式主要為半結構式的訪談，筆者在訪談前給予訪談大綱，³ 並視情境（如配合受訪者在機構、咖啡廳或以研討會方式）與受訪者的性質，改變問題的順序與用語，讓受訪者能自由表達其意見。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在受訪者的選擇上面仍然無法避免誤差，因為受到語言等因素的限制，受訪者的選擇主要為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及與筆者熟識的土耳其退休大使等人協助邀約，雖然筆者也有以電郵邀約學者，但該國習慣仍以電話約定為主，因此在代表性與比例上尚有不足，故僅以附註的方式將訪談內容作為間接佐證，而以官方資料與媒體資料等文獻為主。

本文的第二部分將進行文獻分析，主要針對角色理論與土耳其過去的角色扮演進行回顧，第三部份則主要針對敘利亞出兵行動中，分析美俄兩國的角色期待與土耳其的回應，以探討角色期待與衝突的問題，第四部分則綜合分析土國的角色認知、衝突與結果，並探討國內總統制的改變其影響，最後，則作出結論。

貳、角色理論與土耳其的角色扮演

一、角色理論的研究途徑

角色理論作為外交政策的分析途徑並非新的概念，早在1970年代，K. J. Holsti便提出「國家的角色概念」（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是「決策者對於

立場，這是研究方法上的限制，為了避免受訪者在現行政治氛圍上產生問題（Human Rights Watch 2018），因此採取匿名方式，以避免造成受訪者的困擾。受訪成員主要分為三類，包括政府官員（G類6名）、智庫成員（O類10名）與學術界（A類，深度訪談6位，但亦有研討會部分不列入紀錄），雖然共訪問至少20多名以上的代表性人物，且包含執政黨、反對黨，不過訪談以英語為主。與Haugom（2019）一文的研究限制相同，官方文件的缺乏與政府成員訪談不易，是研究上最大的問題，因此，本文的主要分析以土國總統府與外交部的文件為主，訪談結果僅為補充。

³ 大綱的主題包括三個部分：1. 決策者的認知：包括受訪者對於中東的看法、其所接觸的決策者的認知以及對於土耳其的中東角色看法，也探討受訪者對於美國、俄羅斯、北約、伊朗等國的看法。2. 總統制的影響：包括總統制對決策的影響、總統制下的政黨關係、「零問題外交」是否改變等問題。3. 當前議題的反應：包括土耳其在敘利亞出兵行動、軍售案等議題。

該國家在國際體系或附屬的區域體系中，對一般的決定、承諾、規則、行動、適合其國家的條件、功能的看法」（Holsti 1970, 246）。⁴ 只是傳統外交政策的研究途徑中，仍較少談及「國家如何扮演角色」（Harnisch 2012, 47），雖有些學者強調行為者（領導、知識社群、實際操作者）與過程（學習的指令、規劃與錯誤學習等），但是仍較少談到行為者與結構之間的關係（Harnisch 2012, 47）。而Ikenberry也使用如「國際秩序中的功能性角色」或「霸權的角色」等用詞（Ikenberry 2018, 1）來解釋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外交政策的改變，因而使角色一詞再度受到重視。⁵ 以下從三個面向來說明角色理論與本文的分析層次：

（一）角色理論的內涵

「角色」是「社會的位置」以及「行為的腳本」（Thies 2003），Holsti及後續的研究者主要強調國家角色概念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國家角色的物質、歷史與文化的起源；國內因素對於國家角色的挑戰以及外在行為者對於角色的期待與社會化（Kaarbo 2018, 2）。角色理論試圖解釋與瞭解行為者（agent）與結構（structure）的互動關係（Thies et al. 2012, 1）。在社會環境當中，行為者會對其自身在結構中的處境、位置以及面對「他者」應該採取何種適當的行為，產生「角色概念」（role conception），而這樣的概念則是由語言與行動所型塑（Holsti 1970, 238-239; Bengtsson et al. 2012, 94），而行為者所表現出來的實際的政策行為，就是所謂的「角色扮演」（role performance）。

一個國家的國際角色，也是一種社會位置，更是內在以及外在行為者期待下構成的結果。決策者同時必須要與國內的行為者互動，也必須與國際環境中的「他者」互動（Harnisch et al. 2016, 10）。⁶ 不僅藉由「他者」的眼中來

⁴ 比方說，一個國家如果視自己為霸權或權力平衡者，則其在國際體系中也會扮演相對應的角色。

⁵ 他指出，因近期美國川普總統的相關作為，破壞了許多原先國際關係學界對於美國角色的期待，因而使得包括角色、責任、期待與協議等變項，變成是一個重要的選項（Ikenberry 2018, 7）。

⁶ 不過，角色與認同不同，認同是自我的描述，並不與特定的社會功能或行動有關，認同只是認同（Harnisch et al. 2016, 9）。國家認同會形塑公民的個別觀（personhood），提供「本質上的安全」或「歷史上的自我」，國家與認同本身也是社會結構，決策者

強化此自我，同時也藉由此過程，去實現自我，突破原本的道路，並建立自信。因此這個自我實現的過程需要透過互動來保留與轉換角色。在國家內部的過程中，制度化的政治結構會形塑行為者的自我形象，同時透過外在的期待，建構出「想像中的自我」，而隨著自我的逐步穩定，也轉化成新的社會期待（Klose 2020, 855-857），角色的扮演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首先就是外在的角色期待，其次則是國家的角色概念，也就是領導人試圖呈現給外在世界的「自我形象」（Süleymanoğlu-Kürüm 2019, 685）。而這個互為主體性的過程當中，可能有衝突，並產生不確定性，進而有脫離原本軌道的可能。

一般來說，角色概念除非遇到與其他角色的期待相互衝突時，基本上是不會輕易改變，而在外交政策分析上面，所謂其他角色的期待衝突，通常就是來自於國際談判，透過其他國家或行為者對於該行為者的期待與衝突，進而導致行為者修正其原本的立場，這種從內在的概念與外在的影響互動之過程，而透過被他人認同進而影響其未來外交政策行為的過程，則稱之為「角色的學習過程」（Harnisch 2012, 52-54）。

（二）角色理論作為分析途徑與分析層次

角色理論的貢獻在於其強調個體與結構的互動過程，如Harnisch（2012）所言，傳統外交政策分析多半是「非此即彼」（either or）的（Harnisch 2012, 48），比方說理性主義學派主要強調結構的影響，而建構主義學派則不強調客觀的體系限制，強調能動者與「人類的取決性」，也就是結構與能動者的能動性是相互建構的（宋學文、陳文政2012）。但行為者主要仍是受到外在與內在環境的交互影響，也就是個體與結構的互動過程（Rose 1998, 152; Harnisch 2012, 48）。⁷

每個國家都想要增加其相對的物質權力，但是其追求的過程並不是一樣

也必需要透過立法、聯盟等方式取得認同。（Harnisch et al. 2016, 9）。但是國家的角色期待有時間與範圍的限制，影響角色的因素則包括此群體的結構與目的，以及行為者的想望與能力（即「對角色的承諾」或「願意在角色所做的努力」），這些對於國家的角色具備暫時性（temporality）、功能性（functionality）以及義務（Harnisch et al. 2016, 6-7）。

⁷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討論，有相當多的文獻探討，但礙於本文討論焦點為案例，因此，本文僅主要呈現角色理論的內涵，不擬進一步分析理論間的辯論。

的，這部分就不僅僅是客觀的條件可以影響，也涉及到政治人物的主觀認知，這個認知會影響到其動員能力，進而影響外交政策是否採取持續或改變的立場（Rose 1998, 167, Schweller 2004, 169）。因此，角色理論以「領導者的特質」、「國內政治」與「國家角色扮演」為主要的分析架構，其中又以「領導者的想法」最為重要，也就是領導者的信念與認知（Tziarras 2019, 56）。領導人如何解讀新的秩序，以及從過去秩序中學習經驗，進而根據其信念、情緒、心裡需要、動機與資訊處理的限制，做出政策選擇（Kaarbo 2018, 4）。這部分也涉及領導人如何看待世界及其認為有效的解決問題途徑（如多邊或單邊）。因此，不同的領導者會產生變異，有些會尊重體系，但有些想要挑戰，而這些差異進而影響到政策過程與選項。

在國內政治的層次上，觀察的重點在於國內制度對外交政策的影響（Kaarbo 2018），比方說內閣制或總統制的設計將會影響國際承諾的層級與本質，權力分立的關係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也不同。如內閣制中，聯合內閣的外交政策會較極端，單一政黨主導則會較穩定，同時也取決於政黨的數量與國會支持的程度（Kaarbo 2018, 2）。即便是在極權國家，制度安排也會產生影響，同時包括國內的利益與政府外的組織，如企業、勞工、宗教等，如利益團體的力量也會影響（Kaarbo 2018, 2）。

最後，在角色扮演層次上，國際秩序本身就是角色定位的過程，甚至是「能夠制度化與限制強權的機制」（Kaarbo 2018, 6），而這也是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也就是其對於國家在國際體系與結構下所希望扮演的角色（如區域的秩序、崛起的強權、新近的國家等角色）（Kaarbo 2018, 5-6）。

簡單的說，角色理論認為「人」才是外交政策最後的決策者，而決策者會受到自己與外在的同時影響（Ziemer 2009, 32）。因此，透過瞭解外交政策的菁英與發掘其角色概念，同時討論組織的動態與領導管理風格及國內/國際環境，有助於了解外交政策的動態發展（Campbell 2018）。這也是許多的角色理論研究將焦點放在領導人的主張上（Harnisch 2011; Brummer and Thies 2014），主要除了是因為這些人也代表民意外，同時，角色也引導菁英的行為（Melo 2019, 226），因此，角色理論不僅僅研究「驅動菁英行為的原因」，也研究「菁英行為的產物」，亦即菁英如何競爭、妥協並進而形成新的

角色 (Melo 2019, 227)。

(三) 角色理論的限制與本文的分析途徑

本文的焦點主要放在「驅動菁英行為原因」的層次，亦即菁英或大眾對於角色的選擇以及對外來者的態度 (Huang 2020, 528)，是較不會失焦的做法。而「菁英行為的產物」，甚至是總統的領導風格、相關決策者的決策形態等 (Campbell 2018)，因為許多政權的內部情況並不透明，研究較容易失真。本文認同Huang (2020) 的作法，採取相同的分析途徑，將分析焦點放在外在者的期待、領導者的反應，以及後續的角色扮演為主，並以國內制度的改變 (如半總統制轉變成總統制) 為輔，探索土國在三次出兵行動的作為。

在研究設計上，有學者將分析層次分為「獨立角色」與「互動角色」，所謂的「獨立角色」是國家根據國家利益、角色概念下的戰略行為，亦即國家在全球權力結構下，依據國家利益進行決策，政策制定者如何評估外在結構決定其面對大國的行為與反應，也因此，是根據物質資源，也就是軍事與經濟能力來做出決定，也因此展現出來的是角色創造的層次 (Huang 2020, 529-530)。但「互動角色」則不然，互動角色的行為模式可能看起來不理性，如放棄立即的利益以換取標誌性的所得 (如穩固的雙邊關係)，此種角色為關係式的，強調大國與小國間角色的扮演與責任，並且「為了獲取他者的認同，是可以繼續協商的」 (Huang 2020, 530-531)。

最後，近期的角色理論亦希望處理「不確定性」的問題，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會充滿誤解與無法預期的結果，因此決策者將面臨重新詮釋其角色的選項，與是否改變傳統角色等問題 (Melo 2019, 228-229)。正如Katzenstein (2020) 所提出的「多變權力」 (protean power)，「行為者對於無法估算與不確定性環境的影響」 (Hymans 2020, 410)，特別是當之前的作為無法為未來作法提供可靠的基礎時 (Katzenstein et al. 2018, 80)，行為者可能會成為「多變權力」而非「控制權力」 (control power)，亦即，即興的或創新的回應無法預測的脈絡的作法，行為者無法預期結果，因此會放棄控制 (Katzenstein et al. 2018, 82)，所造成的就是一種「變換形式的權力」 (shape-changing power) (Katzenstein 2020, 481)。也就是說，未必會如同結構主義者以物質資源或國家能力等作為計算方式，導致許多計算僅是「根據地區與情勢的特定意圖行

動」，不具備「方向性」（directionality）（Katzenstein 2020, 493）。

綜上所述，本文的分析層次主要放在外在行為者與國內主要決策的領導人（總統、外長）之間的角色期待與衝突，並希望探討「驅動菁英行為的原因」是「獨立角色」？也就是卡贊斯坦所說的「控制權力」？還是「互動角色」的變換形式的權力？

二、土耳其國家角色的改變

探索土國角色的轉變前，有必要了解其過去的角色為何，方能辨別角色是否有所轉變、衝突與適應。過去已有數篇文章從角色理論探討土國角色的改變，比方說Şevket Ovalı（2013）從土國菁英與外在行為者的演說當中，綜合分析土國外交政策的角色認知以及外在行為者的期待。他認為正義發展黨（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以下簡稱AKP）的作為是對於過去凱末爾主義（Kemalism）角色扮演的斷裂，⁸ 也就是對於西方無條件支持、全球主義與自由主義（如成為歐盟會員國）（Uzer 2020, 284-285; Kösebalaban 2020, 2-3）、並對中東問題保持一定的距離（Ovalı 2013, 5）。

而此一角色的斷裂所展現的，就是土國對外角色從完全靠向西方、強調「最小化」（minimalist）、不干預（non-interventionist）、維持現狀（status-quo oriented），轉變至「區域協調者」的作為（Mufti 2009, 1）。達武特歐魯（Ahmet Davutoğlu）在2009年被任命為外交部長亦為重要的里程碑，根據他的說法，土耳其在這段期間尋求自我的重新界定，也就是「基於其伊斯蘭與奧斯曼的文化，對於全然西化的反省」（Ovalı 2013, 6），此種強調文化的調和，也是一種「橋樑者」的認同，更強調「傳遞者」與「翻譯者」的角色，而非獨斷的行動（Süleymanoğlu-Kürüm 2019, 686）。在他任期中，土國追求「零問題」（zero problem）外交，並與區域經濟整合，同時擔任歐洲委員會的主席、伊斯蘭合作組織的秘書長，以及海灣合作理事會的戰略夥伴

⁸ 凱末爾主義主張國防政策高於其他社會與國家的議題的外交政策，也就是保衛本土安全、減少對外來者的依賴，為最高的信念（Mufti 2009, 27），也因此，過去軍方常常扮演土國政治中的重要角色，特別是政變。不過凱末爾主義所代表的是溫和與謹慎，而整體政策上仍是支持西方，並且希望能夠加入歐盟，與「中東的泥沼」（Middle Easter quagmire）保持距離，是個常用的語詞（Gurpinar 2020, 8）。

(Kösebalaban 2020, 2-3)。在土耳其作為「區域協調者」的角色概念下，新奧斯曼主義與經濟的成長成為支撐此概念的重要因素 (Ovalı 2013, 6-7)，⁹ 也因為將角色界定成和平的促進者、規範的區域領導者，有別於過去以西方為中心，而忽略中東，土國在這個時期更強調中東政策，以及其作為「中間國」、「樞紐國」的地位，使得西方國家成為其中的對象，而非唯一的對象 (Kaliber et al. 2019, 6-7)。¹⁰

「AKP 2023政治願景」(AKP 2023 Political Vision/ AK Parti 2023 Siyasi Vizyonu) 亦描繪了土耳其此階段的特色，即希望持續多邊主義，而非只有以加入歐盟為目標，同時增進伊斯蘭的中東與中亞的關係 (Zan 2016, 52-53)，就是希望與西方國家做出區隔，透過伊斯蘭的連結，扮演中間橋樑國家的角色，以強化其特殊性。

我們從達武特歐魯在2011年講話中也看到這點，他強調：

從安卡拉的角度看世界，就是環繞著土耳其的區域正在轉變中…
今日的土耳其，需要有全新的全球文化、經濟與政治秩序視野，並貢獻更多。…外交政策有三個支柱：政治支柱就是民主改革，經濟支柱

⁹ 「新奧斯曼主義」開始於厄札爾 (Turgut Özal)，他在1983-89年間擔任總理、1989-1993年間擔任總統，採取較為折衷的觀點，既保守、也有伊斯蘭的信仰與奧斯曼帝國過去，同時也對世界經濟開放，其對於奧斯曼主義的途徑主要是多元主義與多文化主義的，試圖解決庫德問題，並希望強化一個更廣泛的國家認同。在外交政策上，則是展現在奧斯曼帝國之前領土的更加積極角色，但他並不反對西方 (Uzer 2020, 279)。同時，因為過去俄國的擴張與西方國家的模稜兩可，形成土國產生「對外部危險的恐懼」的戰略文化，包括外來者與帝國主義以及內部整合的擔憂 (包括對東方與西方的選擇) (Mufti 2009, 16)。此種立場，也就是一個「非東非西」的戰略文化，不僅僅與中東保持距離，也與西方保持距離 (Ozkahraman 2017, 59)。

¹⁰ 據此而生的具體的主張則包括：利用奧斯曼遺產，積極介入地區事務、突出了奧斯曼遺產中的伊斯蘭因素，認為凱末爾主義者過分依賴西方，對海外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命運漠不關心，主張土耳其在對外關係中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並強調土耳其作為奧斯曼帝國的天然繼承者，對海外土耳其人和穆斯林具有保護的責任。同時，認為土耳其應該放棄保守怯懦的外交政策，積極介入地區乃至全球事務 (張向榮 2018, 114-115)。土國也不甘於「橋樑」國家的定位，力圖作為中心國家，並開展積極、多維外交和調解外交，因為土耳其多元的文化與文明背景，適合在國際爭端中承擔調解者的角色 (張向榮 2018, 115)。

就是永續成長，而外交政策支柱就是積極的外交政策…而所謂的2023願景，就是1.「與鄰國整合：土國不再是被敵人包圍，而是朋友」、2.「穩定、安全與繁榮的區域建立：從巴爾幹、中東、高加索到中亞」、3.「整合入歐盟」、4.「土耳其作為全球的強權國：未來在國際組織中貢獻」（Davustoğlu 2011）。

就實務的面向來說，中東政策在2010年之後開始更加重視，並在2012年達到高峰，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土國展現干預的政策，如2011-2013對埃及、對敘利亞、伊朗的核子計畫、什葉與遜尼之爭、IS、以巴衝突等（Işıksal et al. 2018, 1-2），最常拜訪土耳其的國家為伊拉克與庫區政府、美國、北塞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TRNC）、德國、伊朗等（Kuşku-Sömez 2019, 384），但觀察土國對外訪問，雖然達武特歐魯於2009年擔任外長後，大幅提升對於中東地區與亞太地區的拜訪，但是仍及不上拜訪西方國家的次數（Kuşku-Sömez 2019, 385），不過，在國際協議的簽訂上，則以中東地區、東歐與非洲較多，在中東地區的合作也有很多是針對能源合作（Kuşku-Sömez 2019, 390-392），基本上也符合前述土國外交政策的轉變，雖然在2009年更強調中東，但是整體而言仍是「區域的協調者」、「調停者」、「歐盟的候選國」並陳的情況。

不過，土耳其在阿拉伯之春後積極扮演區域協調者的角色，並沒有為該區域帶來民主與穩定，相反的，因為權力空間持續的不確定性，進而使土國將焦點放在「國內與國家」（domestic and national）（Süleymanoğlu-Kürüm 2019, 696）。2013年國內也發生「佔領蓋齊」（Gezi Park）的反政府示威運動，加上2015年與PKK終止停火協議及IS的影響，2015至2016年間土國發生許多的恐怖攻擊，再加上2016年7月的失敗政變，使得土國政府開展了「存活模式」（survival mode），將國家安全放在政治議程的首位，而大規模解雇了外交、軍事等政府官員，也降低了其施行政策的能力（Haugom 2019, 213; Kuşku-Sömez 2019, 397; Aras 2017）。

2018年的選舉更可以看出對西方的態度有了更加明顯的改變，比方說許多政治菁英與民衆皆認為失敗政變可能與西方國家的支持有關。同時，在2018

年選舉中，土耳其官方智庫SETA的Murat Yeşitaş教授也指出土耳其傳統以西方為主的外交政策已是「過往」（thing of the past），目前的外交政策是以「新現實主義」為基礎，也就是土耳其與西方盟邦、俄羅斯、中國、伊朗等各國的關係都同樣重要（Idiz 2018）。原先積極的中東政策也稍顯緩和，直到總統制修憲完成後，才又看到土耳其再次展現其在敘利亞出兵行動上的積極面。

如前述角色理論的分析架構，外在行為者的角色與領導人的角色期待與衝突會影響該國外交政策上的角色扮演，綜觀土耳其的中東政策，也受到外在行為者與領導人兩個因素的影響（Aras 2019; Erhan and Sıvış 2017）：

首先是外在行為者的影響上，土國過去參與美國1990-91年的波灣戰爭，但是卻因為難民等問題帶來反面效果。而美國2003年的對伊拉克戰事，卻促成了土國與伊朗在對抗PKK以及其在伊朗分支庫德自由生活黨（Kurdistan Free Life Party，以下簡稱：PJAK）的合作關係（Altunışık et al. 2011, 576），都對土耳其的安全產生影響。另外，土耳其對於俄羅斯的能源依賴，限制了土耳其在中亞與高加索地區的積極度，而歐盟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也限制了土耳其在此區域的角色，因此，中東成為土耳其唯一能夠發揮影響力的區域，加上「九一一」事件後，許多西方國家將土耳其視為是民主的模型，土國作為協調者的角色也受到西方的鼓勵（Ovalı 2013, 11-13），其中又以美國最重要，在2009-2013年期間，美國認為AKP是中東民主轉型的模型，土耳其可以成為「安全與穩定的提供者」（Işıksal et al. 2018, 2）。而協調者的角色扮演也使埃爾多安個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民衆中獲得高支持度（Ovalı 2013, 15）。

從領導人的角度來看，AKP的執政便是在之前執政黨經濟表現失利的情況下上台，而其執政的口號就是「改變」，因此，其領導階層除了強調奧斯曼帝國的過去歷史，以及其與伊斯蘭世界的紐帶（Altunışık et al. 2011, 577）外，經濟上的發展，特別是能源進口的問題變得重要，¹¹也解釋了土國改善與伊朗及俄國關係的原因之一（Altunışık et al. 2011, 580）。綜上所述，埃爾多安扮

¹¹ 土耳其是東地中海區域除了歐盟之外的主要天然氣消費國，而俄羅斯與伊朗與卡達為主要存量區（Stergiou 2019: 12），特別是土耳其與俄羅斯合作的「土耳其天然氣管線」（土耳其流，Turkish Stream）建造過程中，使得土耳其甚至在俄羅斯與YPG合作時，土耳其仍是噤聲的（Tol 2017）。

演此種「區域協調者」的角色，仍符合其國家利益，也就是較接近考量相關控制權力後的「獨立角色」。

但阿拉伯之春後，美國與西方國家卻開始擔心土耳其國內情勢的發展（Ercan 2017, 67-68），隨著總統制的推動，也開始擔心土耳其是否將走向威權（Tugal 2016; The Economist 2015）。同時，土國的領導階層也開始重新評估其國內外環境的影響。2013年的蓋齊公園抗爭是第一個改變，埃爾多安開始強調不信任西方，甚至反西方成爲主軸（Kaliber et al. 2019, 9）。他強調土國的自主性，「我們被西方擊倒，西方給我們命令，但現在不同，我們坐下來、會談、自己決定，這是現在的土耳其（Kaliber et al. 2019, 9）」。土耳其官方智庫SETA也在2013年的政策報告中指出「爲了應對整個國際情勢的快速變動（美軍攻擊伊拉克、美國的財政危機、阿拉伯之春等），土國必須更加積極地面對區域的問題」（Üstün and Kanat 2013）。

2016年葛蘭組織（Fetullah Gülenist Terrorist Network, FETÖ）的失敗政變，更強化對於美國的反感，根據2016年的民調，79%的受訪者認爲美國才是政變後的籌劃者，而此負面的看法也與美國支持敘利亞的庫德族有密切關聯（Erşen et al. 2019, 7-8）。「歐亞主義」（Eurasianism）也對於土國的愛國主義團體特別有吸引力，因爲該些團體原本就主張要與俄羅斯和解，而歐亞主義的概念從2000年開始，就受到土國內部右翼與左翼的支持，特別是在與西方發生衝突的時候（Erşen et al. 2019, 9）。¹² 因爲兩極體系的結束且盎格魯薩克遜文明面臨深切的危機，土耳其傳統上西化的傾向將會失去效果，「歐亞」成爲土國一個有意義的戰略選項（Alaranta 2018）。

不過，領導階層不變的是對於現實主義的強調，早期現實主義被凱末爾主義者視爲是政治領導菁英的養成（Bildung）基本要素（Gurpinar 2020, 9），只是過去較強調的是國家利益與自主的面向，但是後期則更多是「避險」

¹² 具體的呈現也可以從2016年12月土耳其與俄羅斯及伊朗開始的Astana會談中，相關的評論所看出。透過Astana會談，土耳其開始執行在敘利亞的兩個跨境行動，也就是幼發拉底之盾行動與橄欖枝行動，而支持政府的報紙Daily Sabah則解讀成土國與俄、伊朗的合作「將會爲區域經濟的機會與歐亞的未來鋪路」（Alkin 2018, Erşen and Köstem 2019, 6）。

(hedging) 或「彈性結盟」的概念，以及更願意在國境之外投射武力與外交行為上尖銳的語言 (Haugom 2019, 210)。土國的執政者在不確定國際結構發展以及美國是否會持續介入的風險，採取既合作又競爭的策略仍是較佳的選項 (Guzansky 2015, 233)，因此，俄羅斯甚至是中國便成為美國之外很好的對象。

根據上述對於土耳其外交政策角色的分析，本文的第三個部分將藉由土耳其在敘利亞的出兵行動，進一步探討土國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所轉變，以及驅動菁英行為的原因為何。

參、土耳其的敘利亞出兵行動與角色

土耳其於敘利亞的出兵行動上，主要涉及國際體系下的兩個主要行為者，也就是美國與俄國，雖然伊朗等區域國家仍扮演角色，但並非主要決定因素，因此，本文在論述上聚焦於美國與俄國對於土耳其的期待與土國政治菁英的反應。

一、幼發拉底之盾：獨立角色的角色接受者

(一) 外在行為者的期待

在幼發拉底之盾行動開展前，主要影響因素為俄國與美國的角色期待。

1. 俄羅斯的期待：改善關係並拉攏土耳其以打擊西方

因為2015年所發生的土國F-16戰機擊落俄國的蘇愷24戰機事件，使得土俄關係緊張，此時俄國一開始的主要訴求是要求土國道歉，否則食物進口等制裁不會停止 (BBC 2016)。但在2016年10月土俄兩國的特別代表會談中，俄國代表杜金 (Aleksandr Dugin) 強調俄國在土國政變前兩天就發現一些「不尋常行動」，並指出政變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埃爾多安靠向俄國」，他並強調「歐洲對土國的大門關起，但俄國是敞開的」 (Akyol 2016)。¹³ 這部分就是進一步的希望拉攏土國的情感，並將土國政變因素導向西方。

¹³ 杜金為俄國的重要智囊，且是「歐亞主義」的提倡者。

2. 美國的期待：共同消滅伊斯蘭國

美國此時的主要戰略為消滅IS，因此與敘利亞當地庫德族合作，但與土國有同盟關係，這也是衝突的所在。2016年，當時美國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於8月表示美方支持土耳其的立場，他指出「我們很明確的主張SDF/YPG必須撤回東岸…若他們沒有信守承諾，不論任何情況，現在與未來都不會得到美國的支持，就是如此（period）」（Tharoor 2016）。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幾次的通話中，也一再強調美土關係的重要性。不過，歐巴馬除了持續強調兩國應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外，並沒有特別的作為。¹⁴

相較之下，川普總統上台後，則展現了積極協調的態度，除強調美國對於土耳其作為戰略夥伴與北約盟邦的支持，並希望土國持續參與對抗IS（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7a），同時，派出龐佩奧（Mike Pompeo）訪問土耳其，被視為是兩國關係的重新開始（reset）（The Guardian 2017）。

（二）土國菁英的角色扮演

面對俄國與美國的期待，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在阿拉伯之春後，土國菁英的角色認知轉向至國內經濟與安全問題，同時，政治菁英從2000年開始就有「歐亞主義」的提倡，加上2013年蓋齊公園抗爭與2016年失敗政變，雖然「歐亞主義」成為反對西方的一種說法，但是傳統「非東非西」的戰略文化仍根深蒂固，因此土國菁英的角色扮演主要在掃除可能的安全威脅，並使外來行為者能夠接受。

1. 對俄國角色期待的回應

爲了要處理敘利亞的問題，土國不可能不與俄國協調，埃爾多安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復與俄國的關係，因此在2016年6月6日與普丁的通話中便表示土國會採取「必要的步驟」，以修復與俄國的關係（BBC 2016）。在對俄姿態不斷放軟的情況下，終於促成普丁的訪土，並宣布關係正常化與兩國加強合作

¹⁴ 2016年10月27日與埃爾多安通話中，強調土國在打擊IS的重要性，並支持土國以適當的形式與層級，參與在伊拉克的打擊IS行動，2016年12月的通話中，歐巴馬表示兩國合作反恐的重要性，並強調土國在敘利亞人道援助的表現，表達美土關係的重要性（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6c）。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6a)。

對土國政治菁英來說，俄國的角色期待並不會產生衝突，與俄羅斯的和解符合其國家利益，不論是國際結構的發展或天然氣的需求，因此，仍屬於「獨立角色」的計算。

2. 對美國角色期待的回應

美國的角色期待（反恐、同盟）與土國的角色認知（歐亞主義、安全）基本上是衝突的，且土國對此角色衝突並不打算讓步。土國的決策者一開始就將行動定位為因應土國安全威脅，並與美國與俄國的反應結合（Yeşiltaş et al. 2017, 20）。同時，此時土國受到2016年7月失敗政變的影響，基本上只能專注於解決內部的問題，在這段期間，超過10萬人（包括軍、警、教師、法官、記者等）因為被懷疑與葛蘭組織有關而失去工作，並有約4萬人被逮捕（Deutsche Welle 2017），¹⁵ 政變並促成了2017年的憲政改革，強化總統與文官對軍隊的掌控，使得總統的角色更加強化。

歐巴馬政府明白要求庫德族軍隊撤回東岸的善意，也沒有改變土國此時走向戰略自主與彈性結盟的態度，土國在2016年底自行與俄羅斯及伊朗達成在敘利亞的停火協議，埃爾多安並指責美國對於庫德族恐怖份子的支持，¹⁶ 強調「清除此區域包括IS與PKK等恐怖組織」仍是土國的重要目標（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6b）。

整體而言，「幼發拉底之盾」行動對土國而言，一方面是「沒有足夠能力」去主導，另一方面，其行動意圖僅為「測試其戰術上、操作上與戰略上的機動能力…未來土耳其如何能夠解決這些由恐怖組織發動的問題，並避免PKK利用IS被消滅的機會，造成既成事實」（Yeşiltaş et al. 2017, 11-12）才是主要課題。雖然此時土國菁英的策略包括消除PKK、IS與葛蘭組織的威脅（Yeşiltaş

¹⁵ 在政變後46%的軍事將領被資遣或非自願退役，2018年12月，15154土軍，包括7595軍官（約2016年的23%）被解僱，另外2019年4月還有1386人，政府預計重新聘僱43000新的人員，以改變軍隊傳統作為「世俗派」的支持者，不過人員的清除與軍事革新也影響了土軍的戰略與戰術能力，準備與土氣（Flanagan et al. 2020, xiv）。

¹⁶ 他指出「他們控訴我們支持IS，但他們現在對於恐怖團體的支持，包括IS、YPG/PYD的支持卻已經非常明顯，我們有照片與影片為證」，他更批評美國在土國於al-Bab行動上的承諾並未達成（The Guardian 2016）。

et al. 2017, 17) 三種，但卻以PKK與葛蘭組織的威脅為主，IS並非土國重點，因此與美國目標不同。

而在角色扮演上，雖然俄羅斯與美國都試圖拉攏土國，但是土國此階段主要考量的仍為國家利益等「控制權力」，扮演「獨立角色」而非「互動角色」，不打算為了改變雙方關係而做出未必理性的行為。不過，土國仍十分注意外在行為者的反應，因此，在角色理論的詮釋下偏向「角色接受者」。

二、橄欖枝行動：避險的角色接受者

為了避免PKK的擴張，特別是當YPG控制了曼比治區域後，土國必須要確保從阿札茲（Azaz）到賈拉布魯斯（Jarablus）區域的安全（Yeşiltaş et al. 2017, 13），而有橄欖枝行動的需求。¹⁷

（一）外在行為者的期待：持續拉攏的俄國與政策轉變的美國

為了要在庫德族掌控的Afrin區域進行軍事行動，土國必須要尋求俄國的合作，因為俄國控制了西敘利亞的上空，此時俄國的態度仍是持續拉攏土國，俄國同意土國戰機可以使用其所控制的空中領域，同時，在行動開始的時候，俄國也宣布將部隊從Afrin撤出（Pusane 2020），甚至之後的軍售案與「土耳其流」天然氣管線的合作等，皆持續對土表示友好。

相較之下，美國的政策就相當反覆。川普甫上任時，雖然希望與土國改善關係，但對於如何解決土美關係與敘利亞問題，仍充滿不確定性。比方說川普政府在2017年4月16日土國修憲公投勝利後，仍「希望土國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權與自由…法治與媒體自由是很重要的」（Deutsche Welle 2017），反映出美國對於土國走向總統制是否會變成威權體制的擔憂，但同時川普個人也表達

¹⁷ 埃爾多安在接受訪問時指出「在最後一名恐怖份子離開此區域之前，我們不會離開，另一方面，在其他國家離開之前，我們也不會離開，我們支持敘利亞的統一與團結，從來不希望他是分裂的」（Iddon 2019）。土國外長卡夫索格魯（Mevlut Cavusoğlu）曾於2018年撰文表示：「橄欖枝行動是基於對恐怖主義的侵略行動的自衛…同時，也可避免成為更大的戰事，進而影響歐洲與美國。…再者，該行動也不該被解釋成對於庫德族的攻擊，因為PKK與YPG等恐怖主義份子並不代表庫德族」（Cavusoğlu 2018）。因此，打擊PKK仍是土國的主要認知。

出對於埃爾多安個人的喜好（Yuksel 2017），¹⁸ 只是對於敘利亞的問題，美國似乎沒有確定的解決途徑。

在埃爾多安於2018年總統與國會選舉勝利後，川普立刻與土國達成「曼比治路徑」的共識，也就是YPG必須從曼比治撤兵，兩國分別將在幼發拉底之盾行動與曼比治之間的區域進行巡邏，確保YPG的撤兵，並協助建立由當地阿拉伯裔為主所組成的委員會（Hurriyet Daily News 2018a）。

看似有所進展的美土關係隨即受到「布倫森事件」的影響，¹⁹ 並爆發美國對土的制裁，造成了土國里拉大幅貶值與通膨的危機。2018年10月土國釋放布倫森的同月，發生了沙烏地阿拉伯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的死亡事件，使得美土雙方關係又進一步的和解。川普同意關係進一步的正常化，並強調曼比治路徑與Idlib協議的重要性（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f）。

（二）土國菁英的角色扮演

對土國菁英而言，土國橄欖枝行動的目標為清除Afrin區域的恐怖份子，因此期待美國能夠與土國合作，並停止供應武器給PYD/YPG等恐怖組織（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a）。²⁰ 不過，隨著2018年4月12日敘利亞阿薩德總統使用化學武器之後，敘利亞的衝突有可能升高為兩大主要強國之間的衝突，埃爾多安此時仍希望扮演協調者的角色（Deutsche Welle 2017）。²¹

¹⁸ 川普還提到埃爾多安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他在世界負責一個困難的區域，他非常強大、誠懇地參與，也獲得很高的成就，同時，他也與美國一起合作」（Yuksel 2017）。

¹⁹ 美國在2018年7月要求土耳其釋放被懷疑與葛蘭組織有關而入獄的美國籍牧師布倫森（Andrew Brunson）。

²⁰ 土國的發言人 Ibrahim Kalin在發言中表示：「橄欖枝行動是根據國際法而協助Afrin地區人民的行動，也是為了打擊包括PKK、PYD/YPG與IS等恐怖團體的行動」，同時美國也承諾不會提供PYD/YPG武器，並與土國密切協調，以避免誤解，並強調兩國應該基於互利與相互尊重（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b）。

²¹ 川普警告俄羅斯若繼續支持阿薩德，「美方的飛彈將會來臨」，埃爾多安與川普電話討論敘利亞問題，兩國強調保持密切合作，報導指出，埃爾多安表示「我們非常擔心有些國家對其軍事力量過度自信，將會使敘利亞變成『武力競技』（arm wrestling）場」，並強調他會與俄羅斯協調（The New Arab 2018）。土國總理也說「化學武器的

此時埃爾多安的重點仍是打擊PKK，因此必須在美俄之間尋求共識，而積極地穿梭在兩國之間協調。比方說2017年9月才與美國發表反對伊拉克庫區政府獨立的共同聲明後，隨即與普丁見面探討「敘利亞與伊拉克」的事務（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7c），2017年11月21日與俄羅斯、伊朗三方會談之後，也立即與川普通電「分享索契高峰會所討論的相關內容」（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7d）。因為相關出兵行動不可能不顧美俄兩國的看法，因此，埃爾多安此時所扮演的就是資訊的提供者與協調者的角色。

但因為俄國拉攏的策略並無改變，因此，此時期最重要的仍是處理與政策充滿不確定性的川普政府的關係。埃爾多安不斷地向美國釋放土國對於PKK與葛蘭組織十分重視的訊息（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7b），並希望「西方國家在恐怖份子與土國民眾中做出選擇」（Erdoğan 2017）。²²但在「布倫森事件」中，因為感受到川普政府的強烈要求，埃爾多安雖然仍強調主權，並闡述土國的相關考量，²³仍在壓力之下讓步釋放布倫森。

哈紹吉事件則是土美關係的重大轉折點，有學者認為，埃爾多安總統很聰

行兇者需要付出代價，但是也不應該損害土、俄與伊朗在維持和平上的努力」（Jones 2018）。不過當天Foreign Policy也撰文批評土耳其的雙重標準，認為土耳其名義上支持反IS聯盟，卻在行動上損害此聯盟，「橄欖枝行動」是爲了土國目的而採取的先制行動，這個行動也是爲了要增強土國未來在敘利亞相關談判中影響力的攻擊行動，土國不斷控制敘國領土，並置入行政管轄的結構，同時，土國外長卡夫索格魯強調中東應該要免於宗派主義、勢力範圍、帝國主義的威脅，但是該文認為埃爾多安正在描繪自己成爲遜尼的救星（Yayla et al. 2018）。

²² 「從1960-1997年，土國經歷過四次軍事政變，不僅影響政府，更影響民衆對政府的信心，但AKP執政後推動的改革，卻沒有得到西方盟邦的支持，許多盟邦更給予葛蘭組織的領導份子庇護，此基本上是背棄雙方的關係與根本性的價值。…西方國家領袖必須要選擇站在恐怖份子那一方還是土國民衆」（Erdoğan 2017）。

²³ 我們可以從2018年8月10日土國總統埃爾多安在紐約時報的投書中，他強調美國與土耳其長期的合作關係，反對的是美國的單邊主義，並指出：「除非美國開始回應土耳其的主權並證明其瞭解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危險，否則兩國的夥伴關係將會處於危險」，土耳其在安全上的考量而與美國衝突主要有四個方面，「1. 2016年7月15日由葛蘭組織所引發的政變；2. 美國與PKK在敘利亞分支，也就是PYD/YPG的關係；3. 對於土耳其升高緊張的一系列作爲，以及4. 美國未能理解土耳其因爲敘利亞問題所產生國家安全威脅的嚴重性」（Erdoğan 2018）。

明地運用了哈紹吉的案例，降低其區域對手沙烏地阿拉伯的形象，也轉移了美國對其民主的質疑，同時，又與美國修好，使得其「雖然沒有得到所有他想得到的，但是地位已經提高」（Gall 2018）。這部分我們也可以從土國總統府發佈的新聞訊息明顯的看得出來，從2018年10月開始，埃爾多安密集的與川普對話，光是10-11月就通了四次電話。²⁴

爲了回應美國的戰略需求，埃爾多安總統一方面堅定地強調本身的關切點爲敘利亞的庫德族民兵，²⁵ 另一方面也積極回應美國的戰略需求，以說服川普接受土國的行動。而真正打動川普總統的，是當川普則要求土國承諾繼續打擊IS剩餘份子，同時不能針對並殺害協助美軍多年的庫德族時，埃爾多安強調土耳其將支援美國在敘利亞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並做好避免因爲美軍的撤軍，而產生的權力真空的狀況（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f），²⁶ 促使川普決定讓步，決定撤離敘利亞並制定美軍的撤離計畫（Bolton 2020）。埃爾多安並於紐約時報撰文表示川普總統的撤軍是正確的，強調「土國有能力與承諾來協助當地」。²⁷

從這一系列的談判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從歐巴馬政府時期以來，美國的角色期待就是清除IS的剩餘勢力，埃爾多安的主要策略就是理解此一期

²⁴ 分別是10月21日討論關係正常化、11月1日強調兩國應密切合作（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c）、11月16日訴求美國不要再支持PKK在敘利亞的分支團體（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d），以及11月28日關於烏克蘭議題的討論（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e）。

²⁵ 埃爾多安指出「曼比治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卻受到恐怖組織的控制…現在我們認爲你們（美方）應該清理並移除這些成員，否則我們將會進入曼比治，我說的非常清楚…我們無法忍受一天的延遲」（Hurriyet Daily News 2018b）。並強調對於敘利亞相關恐怖團體持續存在的「合法的安全關切」（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f）。

²⁶ 他更強調「我愛庫德人，但是恐怖份子YPG/PYD/PKK並無法代表庫德人，反而是操弄庫德族的情緒，並承諾他們只會針對恐怖份子」（Bolton 2020）。

²⁷ 他並重申過去土國在Al-Bab的行動是逐戶的清除IS的份子，而非依賴空襲，也因此可以保證基礎設施的完好，讓當地民衆儘速恢復正常生活，因此，土國第一個步驟將會建立一個符合敘國社會的多元穩定部隊，而不是針對庫德族，同時，也會協助當地行政組織的建立，「若當地組成以庫德族居多，即會以庫德多數爲代表，並保障其他少數族群公平的政治代表權」，因此他要求國際社會支持土國的行動（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9a）。

待，並回應川普的要求，進而達到其目的，雖然其仍為「角色接受者」，來回折衝於美俄之間，並深受外在行為者的影響，但其所考量的仍是「獨立角色」為主，也就是邊境的安全、與俄國軍售案的實質利益等，不過為了達成其目的，也可採取「互動角色」，如雖然強調主權與司法的重要性，仍在美國壓力之下釋放布倫森牧師。

三、和平之泉行動：軍事積極化的角色接受者

和平之泉行動前因為與美國達成協議，因此，此行動的重點轉變成如何解決俄國的期待。普丁主張敘利亞的問題應該透過外交與政治途徑解決，他同時認為俄國與美國不同，美國在敘北為非法存在，並未取得當地國家的要求或安理會決議，反之，俄國的存在是為了促成多邊的合作，如修憲委員會的問題，就是俄國、土國、法國與德國等在伊斯坦堡共同努力的結果（President of Russia 2019a）。此時的俄國策略仍以拉攏土國為主，普丁表示尊重土國保障安全的主張，但提出1998年敘土「阿達納協定」（Adana Agreement）仍然有效，並對於Idlib的發展卻是保留態度（President of Russia 2019b），²⁸ 但因為對Idlib解決方式的認知不同，也是後續至今尚無法解決的衝突所在。

埃爾多安這段時間強調土國會盡力回應美國希望土國承擔打擊恐怖份子的期望，同時，為了回應俄羅斯強調多邊會談並排除美國的期待，他也強調多邊的重要性。比方說，他強調「避免權力真空是很重要的，而土國唯一的目標就是打擊恐怖團體」，同時，「憲政委員會應該儘速建立…在幼發拉底之盾行動下，已經有30萬難民回到家鄉，接下來應該擴散到東岸地區，土國會持續透過雙邊與多邊方式（Astana架構）來達成目標」（President of Russia 2019a）。

行動開始後，因為主要行動區域仍涉及美國所掌握的幼發拉底河以東區域，因此積極與美國溝通，雖然美國政界仍有許多不同意見，其他區域行為者包括歐盟、阿拉伯聯盟亦表示反對土國行動（Pusane 2020），但是埃爾多安仍成功以安全威脅及人道救援的重要性，說服川普政府，並獲得美方「不支

²⁸ 這個問題迄今還無法解決，在土耳其支持高加索的衝突後，俄羅斯對土國施壓退出Idlib，甚至亦有消息指出伊朗的軍隊也進入Idlib區，迫使土國撤兵。

持、不介入」（White House 2019）的「綠燈」的訊號。²⁹ 在埃爾多安已經獲得川普的默許後，將焦點放在與普丁之間的關係，但是因為對於敘利亞問題的解決方式有落差，仍是兩國衝突的根源，甚至後來在傳出俄國刻意在會面前讓埃爾多安在門口空等兩分多鐘的事件後，埃爾多安的回應也只是「這是媒體的惡意誤導」（Duvarenglish 2020）而已。因此，這個階段土國對俄國的角色較接近於「互動角色」的角色接受者。相較之下，埃爾多安對美國則仍以安全威脅、權力真空等訴求為主，因此較接近「獨立角色」的角色接受者。

而綜合三次行動，土國菁英主要思考的還是國家利益的問題，如安全、經濟制裁的回應、天然氣管線等「控制權力」，因此是「獨立角色」為主，只有短期衝擊的事件上會採取「互動角色」。再者，在三次行動中，土國都是扮演角色的接受者而非創造者，美俄的反應均影響土國的政策行動。

肆、土國的角色認知、衝突與結果

以下將結合角色理論的概念，探討驅動土國政治菁英行為的主要原因，並簡述國內政治制度改變的可能影響。

一、角色衝突與角色學習

（一）角色的選擇

如前所述，探討驅動菁英行為的觀察點主要可從角色的選擇與對外來者的態度兩個面向著手。綜合上述三個行動，首先在角色選擇的部分，可以看出土國的敘利亞出兵行動基本上口頭上所對抗的都是恐怖主義，以保障國內的安

²⁹ 埃爾多安總統強調「安全趨勢消除恐怖威脅，並促成敘利亞難民返回家鄉的一個必要舉動」（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9b），對土國而言，「難民問題已經超過土國所能負荷的程度，而因為國際社會的不行動，土國決定自己行動，和平之泉的行動是要解決人道危機，進而改善難民的問題……各國要不就加入土國計畫，否則就應該接受難民。任務的目的就是打擊PKK等恐怖團體…反對將PKK與敘利亞庫德族劃上等號」。埃爾多安更對反對出兵的國家指出「一些歐洲國家應該說明為何其國民2014年會在飛往伊斯坦堡的班機中，在已檢查過的行李發生火藥？……那些形容土國是侵略行動的阿拉伯聯盟成員，也應該解釋他們為敘利亞人道危機貢獻了什麼？而且阿拉伯聯盟的宣言並不代表阿拉伯民衆真正的想法」（Erdoğan 2019）。

全。這部分的角色認知其實也是源自於土國的邊境有許多不穩定的國家，過去冷戰時期更有「被敵人所包圍」的思維。不過，2016年開始的行動與過去最大的差異在於，土耳其受到政變的影響，較少提到過去的「新奧斯曼主義」，也就是土耳其作為中東區域的協調者，甚至是領導者的角色。同時，過去所謂的「西方民主的模型」這種概念，也不再是主要的重點，取而代之的，在理論面向就是「新現實主義」與「歐亞主義」，新現實主義通常是用在說明其國家利益，而歐亞主義則是常常用來對抗西方，特別是美國。而若將「新現實主義」與「歐亞主義」結合，其實也反映出土國政治菁英對於國際結構走向多極化的期待，因此不能只有依賴西方，也必須注意與俄國及中國。

2019年由土國智庫TASAM邀集國內外官員、學者等所舉辦的「伊斯坦堡安全會議」後所發表的「博斯普魯斯宣言」，就展現了對於多極體系（甚至是無極）的國際結構認知（Bosphorus Declaration 2019），土國國防部長阿卡爾（Hulusi Akar）也曾以埃爾多安總統的話「世界比五個來的大」，描述其認知「多極」體系的到來（Akar 2020）。

不過，從過去到現在的相關案例中，我們仍甚少看到土國採取「互動角色」，也就是放棄立即的利益以換取標誌性的雙邊關係穩固等作為，只為了得到大國的認同，反而主要仍是採取「獨立角色」，也就是依據卡贊斯坦所說的控制權力來行事，甚至，也有人提出既然川普也對於法治、自由與人權不感興趣，可以更務實的思考「非根據規則的交往」（engagement not based on rules）還是「根據規則的不交往」（rules-based non-engagement）（Kirişci and Toygürç 2019, 1），但短期來看，土國的採取獨立角色的作法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除非疫情後的經濟因素持續影響土國的國家能力，否則土國仍會採取較為積極性的「獨立角色」，而不太可能回到過去以西方為主的凱末爾主義式的「獨立卻不作為」與新奧斯曼主義下「橋樑者」的角色認知，也尚看不出有如卡贊斯坦所稱的因無法控制結果隨興回應的多變權力。同時，也沒有發生如同Huang（2020）所稱獨立角色者容易展現角色創造的層次，因為受限於阿拉伯之春後不確定的國際與國內情勢發展，其主要關心很明顯仍是國際結構的變化與外來者的反應，因此，角色選擇上仍是具有方向性、且考量國家利益的角色接受者。

（二）對外來者態度的回應

放到敘利亞的出兵行動上（如下表1的整理），更可以看出土國從「幼發拉底之盾行動」中，開始與美國的期待有所差距，並開始思考如何與俄國和緩關係的角色學習過程，但受限於國內政變導致能力受限，基本上仍是強調「獨立角色」的角色接受者。進展到「橄欖枝行動」中彈性結盟過程，土國似乎希望能夠在兩大強國中遊走而取得更實質的利益，比方說當俄國願意提供較便宜的武器系統時，土國就選擇購買俄國的武器，卻因而引發美國的強力制裁，但確認美國堅不讓步時，土國也採取如釋放牧師的作法，以換取美國在敘利亞對土國行動的支持。

也就是說，土國仍是角色接受者，十分在意美俄兩強的態度，同時面對制裁的不確定性時，也可以採取「互動角色」而非「獨立角色」。最後，在「和平之泉行動」上，土國最大的困難在於與俄羅斯對於Idlib的解決方式仍有歧異，但是在經濟面向卻又仍需要倚賴俄羅斯的天然氣的管道（土耳其流）順利建立完成，因此，埃爾多安將重點放在美國，說服川普總統在敘利亞的撤兵，以使土國可以在此發揮角色，但是相對的，雖然對俄國有時採取「互動角色」，但仍以「獨立角色」為主，土國在三次行動後也都在區域建立永久的存在，包括公共服務設施（藥局、郵局、學校），並將土耳其里拉成爲當地經濟的實際通用貨幣與重建計劃，這些都與俄國歸還主權的提議衝突（Pierini 2020）。加上土耳其介入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衝突後，因此，俄羅斯在2020年10月空襲Idlib的舉動，便被視爲是「給土耳其的訊息」（Najjar 2020）。

埃爾多安目前仍是採取彈性的結盟關係，主要關心點爲利益，包括對普丁與川普的作法，都希望能按議題「分開處理」（Haugom 2019, 218; Falk 2018），這種更想要交易性政策的而非制度與價值的政策（Haugom 2019, 219），將會持續與外在行爲者產生衝突，而美國與俄國的忍受度爲何，也是未來觀察的重點。而放在行動中國家角色的討論上，土國在行動中仍是獨立角色的角色接受者，但在戰術上面對短期的不確定性因素，會彈性地使用互動角色，以符整體戰略需求的務實作法。

表1 土國於敘利亞行動與角色學習過程

| 土國敘利亞行動 | 國內制度 | 角色認知 | 角色期待 | 衝突與結果 |
|-------------------|------|--|---|--|
| 幼發拉底之盾行動 (2016.8) | 半總統制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背景：政變剛結束，以安全為主軸且能力受限 - 歐亞主義 - 打擊PKK與葛蘭組織為主 - 國內緊急狀態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俄國：拉攏土國、歐亞主義 - 美國：對抗IS、同盟關係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主要與美國有角色衝突，無法因應歐巴馬的期待。同時因川普剛上任，因此仍處於角色摸索與學習階段 - 獨立角色的角色接受者 |
| 橄欖枝行動 (2018.1) | 半總統制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背景：土耳其大選（總統與國會） - 新現實主義的強調 - 打擊PKK為訴求主軸，不過扮演美俄之間的「協調者」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俄國：持續拉攏土國（土耳其流、軍售） - 美國：擺盪的川普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甫上任沿襲過去強調人權、民主，但隨即不再重視 2. 強力制裁（布倫森事件） 3. 撤兵敘利亞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此階段主要是角色學習過程，埃爾多安除持續與俄國交好外，主要的對象仍是與美國的關係，當涉及川普不讓步且祭出制裁時，埃爾多安即刻選擇讓步，以取得美國支持 - 獨立角色的角色接受者為主，但布倫森事件對美採互動角色 |
| 和平之泉行動 (2019.10) | 總統制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背景：總統制的實施 - 緊急狀態的結束與政局的穩定化 - 區域角色的提升與朝向「區域領導者」（哈紹吉事件的影響）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俄國：雖仍想拉攏土國，但是在敘利亞Idlib處理上有衝突 - 美國：要求土國保證持續消除IS勢力、並保障庫德族權利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隨著與川普達成協議，加上國內政局更加穩定，埃爾多安又回到了積極的外交政策，也較少提到「歐亞主義」，相對地，新現實主義仍是主要的論述 - 「獨立角色」角色接受者為主、對俄特定事件採「互動角色」 |

二、總統制與角色扮演

最後，雖然本文以解釋角色理論的第一個面向，也就是「驅動菁英行爲的原因」爲主，不過也試圖理解角色理論的第二個面向，也就是國內制度與菁英行爲的關係，特別是總統制的推動後，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爲何，是否是土國近期在軍事行動上更加積極的原因之一，以下則先探討總統制的影響。

土國改爲總統制之後有幾大特色：1. 因爲採行兩輪選舉，導致總統必須結盟以取得多數，使得結盟政黨可以扮演較爲重要的角色：³⁰ AKP與民族主義運動黨（Milletçi Hareket Partisi，以下簡稱：MHP）兩個政黨的結合，意味著在庫德族的政策上將會持續的抓緊，並希望能夠平衡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Ahval 2018）。2. 因爲MHP對於民族主義的強調，會使得安全議題的強調比個人自由來的重要（Ulgen 2018）。3. 總統取得更大的行政主導權（如發布法令權），³¹ 特別是外交政策，容易集中在總統與其小圈圈內，包括國防部長阿卡爾，情報首長菲丹（Hakan Fidan）與總統特別顧問卡林（Ibrahim Kalin）三

³⁰ 由於總統選舉採取兩輪選舉的方式，雖然可以增加當選者的正當性（土耳其憲法第101條，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只要任何一個政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取得至少5%的選票或10萬的個人連署，都可以提名總統候選人，也給予了非傳統的政治人物競選的機會（Güener 2018, 58）。不過，總統採取兩輪投票，若第一輪無法取得絕對多數，則以前兩名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採相對多數決（土耳其憲法第101條，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也使得在內部多元的土耳其社會，不太容易有總統候選人第一輪就過半，而勢必會在第二輪形成政黨的聯盟關係，進而影響總統在決策時亦須考量聯盟政黨的看法。

³¹ 根據土國憲法第108條，總統府下設國家監督委員會，可對所有公共機構或組織進行行政調查、詢問或檢查，使得總統有很大的權力，同時，第118條也規定了總統可以設置國家安全委員會，並由總統、司法部長、國防、內政、外交、參謀總長、陸海空軍司令所組成（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如此的設計，將有可能導致決策圈集中在總統府，而使得傳統的專業官僚的角色受到限制。但總統的權力也非絕對，比方說雖然賦予總統的法令權，但不能涉及人民的基本權利、不能涉及憲法規定中有關法律保留的事項、已經由法律規範的部分。而且，若有法律與總統的法令相抵觸，以法律爲主，若國會通過與總統之前公布相同主題的法律，以國會法律作爲適用（憲法104條，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不過，也有批評指出，如此將會影響國會的立法權力，影響權力分立原則，但是亦有學者表示修憲的條文基本上是限縮總統的法令權，該條文主要是針對行政部門本身，而若總統的法令與相關法律衝突，亦可由憲法法庭裁決（Güener 2018, 60-61）。

人身上 (Haugom 2019, 214)，同時，在2016年政變後，軍隊 (Turkish Armed Forces, TSK) 的影響力下降，過去軍隊也是在對外出兵上比較保守的，甚至有軍事將領明白反對敘利亞的出兵行動 (Haugom 2019, 214)，但現在出兵行動常常是總統在選前所展現的對西方國家的強硬態度，或者藉由行動試圖贏得選票的方式 (Haugom 2019, 214)，如2018年6月的土耳其大選 (總統與國會) 與橄欖枝行動以及2019年3月的地方選舉與和平之泉行動的提出時機。4. 因為強化了總統與政黨的關係，使得政黨的色彩會對總統產生影響；³² 5. 雖然賦予總統與國會同時競選的機制，但是國會要推翻總統執政並不容易。³³

過去的一半總統制已經是一個加大總統權力並量身打造的，使總統具備更高度合法性與更穩固的權力地位 (吳玉山 2016, 7-8)。而修憲後的總統制，更進一步的強化了總統的直接角色，因此，Kanat (2018) 主張，總統制下的土國外交政策仍會持續「更願意使用武力」、更自信與創意 (assertive and creative) 的外交，但也會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同時，因為權力的集中，弱化了「立憲主義」的相互制衡關係，唯一剩下的制衡武器僅剩下總統與國會須同時改選，也因此，領導人更容易藉由壓制中介團體 (如其他政黨、官僚或貿易團體) 與「戰略性的守法主義」，³⁴ 來減少反對的聲浪。在這樣的情況下，

³² 過去土耳其曾經禁止總統與政黨的關聯性，但是實際運作上有困難，因此新修憲法放開此限制，總統同時也可以領導其政黨，作為其黨員或決定切開與政黨關係 (Gülener 2018, 75)。主要也仍然避免僵局的角度，若政黨領袖與總統不同人，也可能會產生僵局，政黨領袖也可以透過國會的運作杯葛相關立法 (Gülener 2018, 75)

³³ 總統與國會選舉每五年同時選舉 (土耳其憲法第77條,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不過，為了避免行政與立法因為不同選舉時期，而可能導致如美國總統制下的分立政府或跛腳總統的情勢，新的憲法規定如果行政與立法陷入僵局，總統與國會都有權力重新選舉，不過國會要以五分之三的決議通過，以確保國會不會任意使用此權力，同時也避免因為反對黨取得多數時的濫用。同時，特別的是，憲法規定若在總統的第二任期內，國會提出重新選舉的話，該總統在未來的選舉過程中也可以擔任候選人，似乎也意味著，若埃爾多安在第二任的時候，若由國會提出重新選舉，其也有可能第三任的空間 (土耳其憲法第116條,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 Gülener 2018, 52-57)。

³⁴ AKP的過去較成功的就是將軍事權力轉移到總統，不過現在土國展現出來的戰略守法主義 (strategic legalism)，就是使用、濫用或誤用法治，以取得其正當性的目標，具體的作法就是包括：1. 在決策過程中增加行政的任意性原則，2. 創造法律的黑色或灰色地帶，3. 從依法行政轉變成依法統治，4. 建構新的司法體制，使其服膺於行政，5. 技術性使用稅、誹謗等罪壓制對手，6. 扭曲法的可預見性，7. 司法政治化。(Yılmaz

選舉容易成為對領導人的信任公投（Yılmaz 2020, 11），使得領導人可能藉由外交政策（如中東政策）來操弄選情，也因此，總統埃爾多安的角色與領導風格就顯得非常重要。

而目前的制度在沒有完全的制衡關係下，還是有可能容易走向強人政治，從伊斯坦堡市長選舉的過程當中，就可以看出行政權不斷想要增加掌控卻失敗的過程。³⁵ 同時，更可能強化強人政治。但因為土耳其國內政治的多元性，仍造就了此一制度一定程度的韌性，³⁶ 不過，問題仍是：就算埃爾多安不太可能走向強人政治，但制度上的限制仍然不夠健全到可以限制總統的權力，如憲法規定五分之三的議員可以決議改選，但是以目前反對黨不到50%的選票，仍無法做到「不信任投票」的效果，而加上目前執政黨對於包括媒體、司法等面向

2020, 6-7)

³⁵ 而與過去半總統制與內閣制最大的差別在於，過去的行政立法關係有一定的緩衝與協調的機制，同時專業的官僚（如閣員）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改變成總統制之後，容易淪為小圈圈，而且，國會內部也常常在抱怨過去因為行政必須向立法負責，所以在國會中都有固定的聯絡，使議會能夠適時的反應並影響政策，但現在可能連部長都未必是決策者，使得在缺乏協調機制的情况下，容易使得決策淪為少數人的意見（作者訪談，研究員A-2，安卡拉，2019年11月1日；大學教授A-3，安卡拉，2019年11月4日），國會無法與部長直接詢問，只能用書面質詢的方式，而部會首長在決策上，可能更依賴所謂的業界與專家（作者訪談，智庫研究員O-1，安卡拉，2019年10月31日；大學教授A-3，安卡拉，2019年11月4日）。

特別是2016的失敗改變改變了許多人的行為，有些人為了證明自己與改變無關，反而會走向更激進的作為（作者訪談，大學教授A-1，安卡拉，2019年10月31日）。不過，土國政府官員表示就他的了解，他認為埃爾多安總統其實蠻尊重專家的意見的。土耳其改成總統制，基本上是利多於弊，決策更快、更短，當然不能否認的是相對缺乏槓桿（leverage），因為總統決定後就定案。因此，對國內政治而言，總統制有助於國內政局的穩定，但是對國際關係則有時不然（作者訪談，政府官員G-4，安卡拉，2019年10月30日）。但是，不論總統是否尊重專家意見與否，都可以看得出制度本身過度依賴領導人的狀況。

³⁶ 比方說，總統在形成其行政團隊上基本上會考量四個點：專業、政黨、宗教、種族，以回應土耳其內部的多元性，但不可避免地，有時候政策就必須要滿足土耳其東部的人（作者訪談，智庫研究員O-1，安卡拉，2019年10月31日），也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部分。但是土國內部的主要政黨的立場也非固定，也常會改變立場（作者訪談，記者O-8、記者O-9，安卡拉，2018年7月24日），必須要分辨該政黨到底是主張伊斯蘭還是愛國主義。也就是說，土耳其不是一個固定概念的國家，也因此，雖然土耳其改變成總統制，西方國家習慣將其與埃爾多安總統直接連結，但是總統或制度也未必直接促成政策，而仍有一個民主的過程（作者訪談，智庫研究員O-1，安卡拉，2019年10月31日）。

的控制，將使得制度上強人的危險性仍舊存在。³⁷

伍、結論

回到本文一開始的問題：土耳其進行這麼多次的行動，究竟希望達到什麼？它的角色究竟是土國所稱的「安全」問題？還是「強人政治」的展現或「區域的強權」的戰略角色？本文認為，土耳其在這個過程中，符合角色理論中「角色學習」的過程，首先在幼發拉底之盾行動中，土國的認知確實是安全問題，特別是恐攻事件的頻傳與政變，使其無法再像過去一樣的主張「新奧斯曼主義」，但美國則是期待土國能夠以打擊IS為主，因此在角色衝突的情況下，土耳其開始靠向「較能理解土國」的俄羅斯。³⁸

³⁷ 2019年10月的民調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明確說明「支持」埃爾多安，但土裔只有27%，雖然74%AKP選民表示他們將會「忠誠的」支持他，但這對埃爾多安來說也就是警告的訊號（Hoffmann 2020）。2020年4月的民調顯示，有38%的民衆認為現任的內政部長索魯（Süleyman Soylyu）可以是埃爾多安之後另一個領袖的可能，更獲得過半的喜好度，特別是年輕選民的支持，以目前年輕人高達25%的失業率，對於2023年的埃爾多安選情，將有可能會增加數百萬的變數（Hoffmann 2020）。近年索魯採取「土耳其優先」的立場，未來埃爾多安總統是否會順應這個民意的潮流，採取更加強硬的中東政策，還是認為索魯是個可能的威脅，則有待觀察。

³⁸ 不過對於俄羅斯的態度，在受訪者中卻也有不同看法，比方說，有人認為俄羅斯在歷史上較為理解土國的發展，因此，土國與俄羅斯的合作較為容易，相對的，美國則顯示較為單邊且霸權的要求，土國較無法接受，但俄羅斯不同，主要是傳達訊息，小心地釋放兩國之間可以在哪些範圍進行合作（作者訪談，政府官員G-1，安卡拉，2019年11月1日；智庫研究員O-1，2019年10月31日）。若理解內部的多元性，則對土國會有更多的理解，俄羅斯在這個部分就比美國做得好，美國習慣將土耳其視為一個整體，但事實上內部還有許多的分歧（作者訪談，智庫研究員O-1，安卡拉，2019年10月31日）。

但是，亦有人認為這只是國家利益下的選擇。俄羅斯對土國而言就是一個重要的鄰國，以敘利亞的問題為例，其實與土國並不相關，但是敘利亞區域的庫德族問題，將會影響土國的安全，所以土國必須介入，而與俄羅斯的關係主要是因為國際體系朝向多極的發展，土國勢必要發展與俄國甚至與中國的關係，雖然美國非常不滿意，但是包括購買武器與戰機等問題上，土國基於利益上做出選擇並不是錯誤的。美國短期無法理解，但是最後也會理解到，因為美國社會也是多元的聲音，不像俄羅斯與中國，不同的意見會被打壓，而土國也有關於塞普勒斯的問題，也需要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不可能不與這些國家打交道，他也認為若說土耳其是在「避險」，還不如說每個國家都有其國家利益（作者訪談，政府官員G-5，安卡拉，2019年10月30日）。

而隨著土國政治逐步的穩定，解除其緊急狀態之後，土國開始面臨實質利益的問題（比方說與俄羅斯的「土耳其流」管線鋪設），但是卻也不能忽略美國的態度，特別是川普總統較無法捉摸的領導風格，因此土國在「橄欖枝行動」中，基本上是一個角色學習的過程，在衝突與妥協中不斷探究強權的底線為何，但觸及底線立即退讓（如美國制裁後釋放布倫森）。

也因此，從「橄欖枝行動」到「和平之泉行動」過程中，可以看出埃爾多安忙於與美俄兩國元首折衝與交換訊息，並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但是，隨著柯紹吉事件的推波助瀾，並得到川普的「綠燈」訊號後，目前埃爾多安在疫情後的行動其實是相當積極地回到了過去「區域的領導者」的立場，並更修正了「零問題」外交，反而不怕問題的產生，在中東問題上也就是持續採取「積極獨立角色」（active independent），不過短期來看仍會是一個「角色接受者」而非「角色創造者」，埃爾多安的作為從三次出兵行動來看，他仍時時的關心「受聽者」的反應，也就是川普與普丁等人的看法，外在行為者仍扮演重要影響因素。土國根據國家利益採取更加獨斷的外交政策，仍會展現出其願意增進與強化與他國的關係，而非過去避免介入的角色。同時，雖然「積極獨立角色」也包含了「橋樑者」的角色，但已非達武特歐魯時期僅為「橋樑者」角色（Süleymanoğlu-Kürüm 2019, 686），而是以獨斷的需求為主體，也就是說，在AKP與埃爾多安的執政下，土國的中東戰略思考其實歷經了「獨立角色」（避免介入）、「橋樑者」（區域協調者）至積極獨立角色（區域的領導者）的三個階段。而土耳其擺盪在「接受角色」與「互動角色」之間，亦是中小型國家面臨「權力不對等」下的大小國互動模式（吳玉山 2020, 132），雖然想要採取「樞紐」的策略，但是對於中小型國家而言，由於樞紐的風險特別高（兩強可以對其施加絕對壓力）（吳玉山 2020, 144），所以當美國的川普總統施加壓力（如制裁）或希望美國接受土國提議（如撤兵）時，埃爾多安即採取「互動角色」，而當與俄羅斯在Idlib衝突展開時，也採取對俄的「互動角色」，因此，未來的發展是否對土國來說，樞紐的角色是個「可欲」但卻「玩不起」的角色（吳玉山 2020, 143），而將走回靠向一邊多一些的避險，是值得觀察之處。

同時，在總統制的修正後，由於必須與強調民族主義的政黨（MHP）結

盟，更強化了「區域領導者」的角色。只是隨著俄羅斯空襲敘利亞以及美國拜登政府政策與區域國家的不確定性，³⁹ 加上國內經濟問題，也使疫情後的土耳其戰略角色，仍會有新一波的角色學習過程。未來相關研究若可加入如區域國家的期待與土耳其的回應，並深入探討菁英之間的競爭行爲，將可更完整的描述土國的戰略角色。

（收件：109年12月1日，接受：110年10月7日）

³⁹ 土國非阿拉伯裔，加上土耳其對於伊斯蘭的解釋較爲民主化與世俗化，同時阿拉伯世界也不喜歡奧斯曼帝國的過去，因此土耳其也很難在中東扮演更積極「權力平衡者」的角色（作者訪談，大學教授A-1，安卡拉，2019年10月31日）。

Turkey's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n Military Deployments in Northern Syria

Shun-Wen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role theory,” this paper deals with Turkey's military deployments, including 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 in 2016, Operation Olive Branch in 2018, and Operation Peace Spring in 2019. Scholars of role theory focus on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State” and “Others”. They not only analyze “what motivates political elites' behavior,” but also discuss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 and their impacts on leaders and foreign policies. In response to other states' expectation, there are two types of roles: the independent role that is based on national interests/ role making, and the interactive role that is based on others' role expectation/ role-taking.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ole during the military deployment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urkey's role conception in the past. Through analysis of negoti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t concludes that Turkey plays mostly as an independent role taker. Its role-play starts from bridg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then finally becoming a regional leader. Additio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fter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further enhanced the president's role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effects on Turkish Middle East policy.

Keywords: 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 Operation Olive Branch, Operation Peace Spring, role theory, Turkey.

參考文獻

- 吳玉山，2016，〈半總統制與策略性修憲〉，《政治科學論叢》，69：1-26。Wu, Yu-Shan. 2016. “Banzongtonghi yu celuexing xiuxian”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Strategic Restructuring of the Constitution].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9:1-26.
- 吳玉山，2020，〈不均衡戰略三角與兩岸關係的比較性研究〉，趙永茂主編，《資訊時代下的世界新秩序、新典範與新治理》：131-156，新北市：致知學術。Wu, Yu-Shan. 2020. “Bujunheng zhanlue sanjiao yu liangan guanxi de bijiaoxing yanjiu” [Unbalanced Strategic Triangle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Yung-mau Chao eds., “*Zhixun shidai xia de shijie xinzhi xu xindianfan yu xinzhili*” [*World New Order, New Paradigm and New Governance in the Information Era*], pp. 131-156. New Taipei City: Zhizhi Xueshu.
- 宋學文、陳文政，2012，〈能動者與結構：在本體論分析層次上的爭論〉，《問題與研究》，51(1)：1-35。Song, Hseik-Wen, York W. Chen. 2012. “Nengdongzhe yu jiegou: zai bentilun fenxi cengci shang de zhenglun” [Agent and Structure: The Ontological and Level-of-Analysis Debates]. *Wenti Yu Yanjiu*, 51(1):1-35.
- 張向榮，2018，〈『新奧斯曼主義』：歷史嬗變與影響〉，《新疆社會科學》，2：108-118。Zhang, Xiang-Rong. 2018. “Xinaoximan zhuyi: lishi shanbian yu yingxiang” [Neo-Ottomanism: Historical Changes and Effects]. *Xing Jian Social Science*, 2:108-118.
- 劉燕婷，2019，〈劉燕婷觀點：在邊疆重拾帝國榮光-土耳其為何入侵敘北〉，《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1830679>，查閱時間：2020/01/23。Liu, Yen-Ting. 2019. “Liu Yan Ting guandian zai bianjiang zhongshi diguo rongguang- tuerqi weihe ruqin xubei” [Liu Yan Ting’s Opinion: Regaining past Empire’s Glory in the border- Why Turkey Invaded Northern Syria]. *The Storm Media* (Accessed on January 23, 2020).

- Abadi, Cameron. 2019. "Why is Turkey fighting Syria's Kurds."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0/17/turkey-claim-syrian-kurds-terrorists-not-isis-ypg-pkk-sdf/> (October 29, 2020).
- Ahval, 2018. "Turkey's shift to presidential system to impact foreign policy." <https://ahvalnews.com/foreign-policy/turkeys-shift-presidential-system-impact-foreign-policy-egyptian-news> (October 30, 2020).
- Akar, Hulusi. 2020. "Turkey'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Latest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 the Region Confi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7TNil8xRyE> (July 29, 2020).
- Akyol, Mustafa. 2016. "Is Russia pulling Turkey away from the West?"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10/turkey-russia-urges-ankara-desert-west.html> (January 12, 2021).
- Alaranta, Toni. 2018. "Turkey's presidential system and the Kurds. Increased resentment, fragmentation, or deal-making." https://www.fiia.fi/wp-content/uploads/2018/11/bp251_kurds_in_turkey.pdf (November 11, 2021).
- Alkin, Kerem. 2018. "Turkey, Iran, Russia Will Carry Eurasia into the Future." <https://www.dailysabah.com/columns/alkin-kerem/2018/04/07/turkey-iran-russia-will-carry-eurasia-into-the-future> (October 20, 2020).
- Altunisik, Benli M. and Lenore G. Martin. 2011. "Making Sens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AKP." *Turkish Studies*, 12: 569-587.
- Aras, Bülentç. 2017.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July 15*. Istanbul: Istanbul Policy Center.
- BBC. 2016. "Putin and Erdogan mend ties after Russia-Turkey jet incident."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6663127> (June 6 2020).
- Bengtsson, Rikard and Ole Elgström. 2012. "Conflicting Role Concep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in Global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8:93-108.
- Bolton, John. 2020.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 New York: Simons & Schuster.
- Bosphorus Declaration. 2019. "New World Architecture of Economic and

- Security.” *Istanbul: 5th Istanbul. Security*. https://tasam.org/Files/Etkinlik/File/Deklarasyon/IGK5_Deklarasyon_EN_pdf_d7871892-7ded-41d1-99c3-91574f756e01.pdf (Jun 6, 2020).
- Brummer, Klaus and Cameron G. Thies. 2014. “The Contested Selection of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1(3): 273-293.
- Campbell, Steven. 2018. “Role Theory, Foreign Policy Advisers, and US Foreign Policy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59(1): 43-55.
- Cavusoğlu, Mevlut. 2018. “The meaning of Operation Olive Branch.”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4/05/the-meaning-of-operation-olive-branch/> (October 20, 2020).
- Delay, Galip. 2018. “How will Turkey’s foreign policy change under the new system?”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18/7/10/how-will-turkeys-foreign-policy-change-under-the-new-system/> (Nov. 11, 2021).
- Davutoğlu, Ahmet. 2011. “Speech entitled ‘Vision 2023: Turkey’s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delivered by H.E. Ahmet Davutoğlu,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t the Turkey Investor Conference: The road to 2023 organized by Goldman Sachs (London, 22.11.2011).” http://www.mfa.gov.tr/speech-entitled-_vision-2023_-turkey_s-foreign-policy-objectives_-_delivered-by-h_e_-ahmet-davutoglu_-minister-of-foreign-af.en.mfa (October 20, 2020).
- Deutsche Welle. 2017. “Trump takes a risk with Erdogan.” <https://www.dw.com/en/trump-takes-a-risk-with-erdogan/a-38479133> (November. 10, 2020).
- Duvar English. 2020.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Putin making Erdorğan wait.” <https://www.duvarenglish.com/diplomacy/2020/03/10/what-is-the-significance-of-putin-making-erdogan-wait> (October 20, 2020).
- Ercan, Pinar Gözen. 2017.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galitz and Global Reach*.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Erdogan, Recep Tayyip. 2017. “Turkey, a year after the attempted coup, is defending democratic valu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jul/15/turkey-coup-democracy-recep-tayyip-erdogan> (October 10, 2020).

- Erdoğan, Recep Tayyip. 2018. "Erdogan: How Turkey Sees the Crisi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0/opinion/turkey-erdogan-trump-crisis-sanctions.html> (November 11, 2021).
- Erdoğan, Recep Tayyip. 2019. "Turkey Is Stepping Up Where Others Fail to Act." <https://www.wsj.com/articles/turkey-is-stepping-up-where-others-fail-to-act-11571093850> (October 11, 2020).
- Erhan, Çağrı and Efe Sıvış. 2017. "Determinants of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sight Turkey*, 19(1): 89-115.
- Erşen, Emre and Seçkin Köstem. 2019. *Turkey's Pivot to Eurasia.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alk, Richard. 2018. "Richard Falk on Pres. Erdogan's regional policies & prospects." <http://www.buzzsprout.com/2366/749947-richard-falk-on-pres-erdogan-s-regional-policies-prospects> (October 11, 2020).
- Flanagan, Stephen J. , F. Stephen Larrabee, Anika Binnendijk, Katherine Costello, Shira Efron, James Hoobler, Magdalena Kirchner, Jeffrey Martini, Alireza Nader, Peter A. Wilson. 2020. *Turkey's Nationalist Course.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Turkish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he U.S. Army*,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 Gall, Carlotta. 2018. "Erdogan Didn't Get All He Hoped For in Khashoggi Case, but His Stature Ris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11/21/world/middleeast/erdogan-khashoggi-trump.html> (January 20, 2019).
- Gülener, Serdar and Nebi Mİş. 2018. "The presidential system's constitutional design." In Mİş, Nebi and. Burhanettin Duran, eds., 2018. *Turkey's Presidential System*. Ankara: SETA.
- Gurpınar, Dogan. 2020 "Foreign Policy as a Contested Front of the Cultural Wars in Turkey: The Middle East and Turkey in the Era of the AKP."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65): 3-21.
- Guzansky, Yoel. 2015. "Strategic Hedging by Non-Great Powers in the Persian Gulf." In Klieman, Aharon, eds., *Great Power and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

- Affairs in a Rebalancing World*, pp. 231-252, Switzerland: Springer.
- Harnisch, Sebastian. 2011. "Deutschlands Rolle in Afghanistan: State-Building-Dilemmata einer Zivilmacht." *Außen Sicherheitspolitik*, 4: 223-251.
- Harnisch, Sebastian. 2012.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8: 47-69.
-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Carsten Gottwald (eds.). 2016.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London: Routledge.
- Haugom, Lars. 2019. "Turk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Erdogan: A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38(3): 206-223.
- Hoffmann, Max. 2020. "Turkey's President Erdoğan Is Losing Ground at Home."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reports/2020/08/24/489727/turkeys-president-erdogan-losing-ground-home/> (September 13, 2020).
- Holsti, Kalevi J. 1970.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4: 233-309.
- Huang, Chiung-Chiu. 2020. "Interpreting Vietnam's China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theory: independent role versus interactive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4(4): 524-543.
- Human Rights Watch. 2018. "Turkey: Government Targeting Academics: Dismissals, prosecutions Create Campus Climate of Fear." <https://www.hrw.org/news/2018/05/14/turkey-government-targeting-academics> (June 20, 2018).
- Hurriyet Daily News. 2018a. "Trump, Erdoğan confirm commitment to Manbij roadmap in phone call." <https://www.hurriyetdailynews.com/trump-erdogan-confirm-commitment-to-manbij-roadmap-in-phone-call-133835> (October 20, 2021).
- Hurriyet Daily News. 2018b. "Erdoğan, Trump discuss Syria as Turkey warns of new military operation." <https://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ey-will-enter-syrias-manbij-if-us-fails-to-remove-ypg-erdogan-139715> (October 20, 2021).
- Hymans, Jacques E. C. 2020. "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 The concept of protean power: change we can believe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2020:12:410-

421.

- Idiz, Semih. 2018. "After Erdogan's win, what's next for Turkey's foreign policy?"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8/07/turkey-what-will-happen-to-ties-with-west-in-new-system.html> (October 20, 2021).
- Iddon, Paul. 2019. "Euphrates Shield to Peace Spring: Turkey's incremental dismantlement of Syrian Kurdish autonomy." <http://globalcomment.com/euphrates-shield-to-peace-spring-turkeys-incremental-dismantlement-of-syrian-kurdish-autonomy/> (September 19, 2021).
- Ikenberry, G. John. 2018. "Reflections on After Vict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1-15.
- Işık, Hüseyin and Oğuzhan Göksel (eds.). 2018.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Encounters after the Arab Spring*. Cham: Springer.
- Jones, Dorian. 2018. "Turkey to Mediate Between US, Russia on Syria Tensions." <https://www.voanews.com/europe/turkey-mediate-between-us-russia-syria-tensions> (June 20, 2018).
- Kaarbo, Juliet. 2018. "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on After Vict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1-11.
- Kabalan, Marwan. 2019. "How Turkey's 'Peace Spring' changed the dynamics of Syria's war."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turkey-peace-spring-changed-dynamics-syria-war-191014165613108.html> (July, 10, 2020).
- Kaliber, Alper and Esra Kaliber. 2019. "From De-Europeanisation to Anti-Western Populis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Flux."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54(4): 1-16.
- Kanat, Kılıç Burçra. 2018. "New road map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ttps://www.setav.org/en/new-road-map-for-turkish-foreign-policy/> (March 23, 2020).
- Katzenstein, Peter J. and Lucia A. Seybert. 2018. "Protean Power and Uncertainty: Exploring the Unexpected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2:80-93.
- Katzenstein, Peter J. 2020. "Protean power: a second look." *International Theory*,

12:481-499.

- Kirişçi, Kemal and İlke Toygürç. 2019. "Turkey's New Presidential System and a Changing West: Implications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ey-West Relations."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01/20190111_turkey_presidential_system.pdf (August 11, 2020).
- Klose, Stephan. 2020. "Interactionist role theory meets ontological security studies: an exploration of synergies between socio-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3): 851-874.
- Kösebalaban, Hasan. 2020. "Transformation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 Syria: The Return of Securitization." *Middle East Critique*, 2020:1-10.
- Kuşku-Sömez, Eda. 2019. "Dynamics of chang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evidence from high-level meetings of the AKP government." *Turkish Studies*, 20(3): 377-402.
- Melo, Daniela F. 2019. "Outmaneuvering Kissinger: Role Theory, US Intra-elite Conflict, and the Portuguese Revolu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5:224-243.
- Mufti, Malik. 2009. "Daring and Caution in Turkish Strategic Culture." *Republic at Se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Najjar, Farah. 2020. "Russian strike on Syria's Idlib fighters a 'message' to Turkey."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10/27/russian-strike-in-syrias-idlib-a-message-to-ankara> (October 27, 2020).
- Ovalı, Şevket. 2013. "Decoding Turkey's Lust for Regional Clout in the Middle East: A Role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20(1): 1-21.
- Ozkahraman, Cemal. 2017. "Failure of Peace Talks between Turkey and the PKK: Victim of Traditional Turkish Policy or of Geopolitical Shifts in the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4(1): 50-66.
- Pierini, Marc. 2020. "New Power Struggles in the Mediterranean." <https://>

- carnegieeurope.eu/2020/07/30/new-power-struggles-in-mediterranean-pub-82403 (August 10, 2020).
-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6a.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to Visit Turkey.”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53523/russian-president-putin-to-visit-turkey> (October 11, 2021).
-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6b.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U.S. President Obama.”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53523/russian-president-putin-to-visit-turkey> (October 11, 2021).
-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6c.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U.S. President Obama.”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66426/telephone-conversation-with-us-president-obama> (October 11, 2021).
-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7a.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78721/abd-baskani-trump-ile-telefon-gorusmesi> (October 11, 2021).
-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7b.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78721/abd-baskani-trump-ile-telefon-gorusmesi> (October 11, 2021).
-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7c.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to Visit Turkey.”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83674/rusya-federasyonu-devlet-baskani-vladimir-putinin-ulkemizi-ziyareti> (October 11, 2021).
-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7d.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87463/phone-call-with-us-president-trump> (October 11, 2021).
-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a.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89214/cumhurbaskanimiz-sayin-recep-tayyip-erdogan-ile-abd-baskani-donald-j-trump-arasindaki-gorusmeye-iliskin-basin-aciklamasi> (October 11, 2021).
-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b. “Statement on the Phone Call

Between Presidential Spokesperson Ambassador İbrahim Kalın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General H.R. McMaster.”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89229/statement-on-the-phone-call-between-presidential-spokesperson-ambassador-ibrahim-kalin-and-us-national-security-advisor-general-hr-mcmaster> (October 11, 2021).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c.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99503/phone-call-with-u-s-president-trump> (October 11, 2021).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d.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99681/phone-call-with-u-s-president-trump> (October 11, 2021).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e.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99845/phone-call-with-u-s-president-trump> (October 11, 2021).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f.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100114/phone-call-with-u-s-president-trump> (October 11, 2021).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9a. “The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tccb.gov.tr/en/articles/1900/100466/the-article-published-in-the-new-york-times> (October 11, 2021).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9b.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102104/phone-call-with-u-s-president-donald-trump> (October 11, 2021).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9b. “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110960/phone-call-with-u-s-president-donald-trump> (October 11, 2021).

President of Russia. 2019a. “News Conference following Russian-Turkish Talks.”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718> (October 11, 2021).

President of Russia. 2019b. “Statement for the press and answers to media questions

- following Russia-Turkey talks.”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247> (October 11, 2021).
- Pusane, Ozlem Kayhan. 2020. “Turkish Public Diplomacy and Operation Peace Spring.”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1/turkish-public-diplomacy-and-operation-peace-spring/> (December 20, 2021).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144-172.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2): 159-201.
- Stergiou, Andreas. 2019. “Geopolitics and Energy Securit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 Formation of new ‘Energy Alliances’.” In Tziarras, Zenonas, eds., *The New Geopolitic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rilateral Partnerships and Regional Security*, pp. 11-30. Oslo: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 Süleymanoğlu-Kürüm, Rahime. 2019. “Role theor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urkish regional foreign policy.” *Istanbul Ticaret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18(35): 681-700.
- Tharoor, Ishaan. 2016. “Turkey’s Syria offensive is as much about the Kurds and ISI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08/24/turkeys-syria-offensive-is-as-much-about-the-kurds-as-isis/> (May 19, 2020).
-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2018.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https://www.anayasa.gov.tr/en/legislation/turkish-constitution/> (July 16, 2019).
- The Economist. 2015. “Forward to the past; Turkey’s future.”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4/12/30/forward-to-the-past> (February 15, 2020).
- The Guardian. 2016. “Turkey and Russia ‘agree terms of Syria ceasefir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dec/28/turkey-russia-agree-terms-syria-ceasefire> (January 13, 2020).
- The New Arab. 2018. “Erdogan, Trump discuss Syria crisis in phone call.” <https://>

- english.alaraby.co.uk/english/news/2018/4/12/erdogan-trump-discuss-syria-crisis-in-phone-call (October 20, 2020).
- Thies, Cameron G. 2003. "Sense and Sensibility in the Study of State Socialisation: A Reply to Kai Alders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9(4):543-550.
- Thies, Cameron G. and Marijke Breuning. 2012. "Integrat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Role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8:1-4.
- Tol, Gönül. 2017. "Why is Turkey silent on Russia's cooperation with the Syrian Kurds?"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12/why-is-turkey-silent-on-russias-cooperation-with-the-syrian-kurds/> (October 20, 2020).
- Tugal, Cihan. 2016. "In Turkey, the regime slides from soft to hard totalitarianism."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cihan-tugal/turkey-hard-totalitarianism-erdogan-authoritarian> (October 20, 2020).
- Tziarras, Zenonas(ed.). 2019. *The New Geopolitic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rilateral Partnerships and Regional Security*. Oslo: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 Ulgen, Sinan. 2018. "Get ready for a more aggressive Turke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7/02/turkeys-foreign-policy-is-about-to-take-a-turn-to-the-right/> (October 20, 2020).
- Üstün, Çığdem. 2016. "Turkey's Policies in Its Overlapping Neighbourhood with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Piet, Remi and Licia Simao, eds., *Security in Shared Neighbourhoods.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Turkey and the EU*, pp.53-7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Uzer, Umut. 2020. "Conservative Narrative: Contemporary Neo-Ottomanist Approaches in Turkish Politics." *Middle East Critique*, 29(3): 275-290.
- White House. 2019. "Statement from the Press Secretar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s-secretary-85/> (October 20, 2020).
- Yayla, Ahmet S. and Colin P. Clarke. 2018. "Turkey's Double ISIS Standard."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4/12/turkeys-double-isis-standard/> (October

20, 2020).

Yeşiltaş, Murat. Merve Seren and Necdet Özçelik. 2017. *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 Implementation and Lessons Learned*. Ankara: SETA.

Yılmaz, Zafer. 2020. “Erdoğan’s presidential regime and strategic legalism: Turkish democracy in the twilight zone.”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2020: 1-24.

Yuksel, Canberk. 2017. “Erdogan, Trump holds talk in New York.” <https://www.aa.com.tr/en/americas/erdogan-trump-hold-talks-in-new-york/916429> (October 20, 2020).

Zan, Tao. 2016. “‘Turkey Dream’ and the China-Turkish Cooperation under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in Asia)*, 10(3): 51-64.

Ziemer, Veronica. 2009. *Zwischen Europa und Amerika. Polens Außenß und Sicherheitspolitik nach 1989*.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